

Clothing
Tells All

衣不蔽体

二十世纪中国人的
服饰与身体

衣衫只有脱离了身体，
离开了它的主人，
才可能以它本真而单纯的模样存在。



赤桦
著

衣不蔽体

老村題

二十世纪中国人的
服饰与身体

赤桦

著

广西民族大学出版社



桂林

衣不蔽体
YIBUBIT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衣不蔽体：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服饰与身体 / 赤桦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5598-0324-5

I. ①衣… II. ①赤… III. ①服饰文化—研究—
中国—20世纪 IV. ①TS94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3174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昭泰子隆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南宁市友爱南路 39 号 邮政编码：530000)

开本：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9.625 字数：250 千字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5 000 册 定价：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引言 脱也有是，穿也有非 / 1

说话的衣衫	民国女装，风来满路香 / 8
	旗袍：性感的远东神话 / 22
	月份牌上竞妖娆 / 33
	民国男装，三足鼎立 / 41
集体审美	制服的海洋 / 62
	“毛式中山装” / 66
	干部服 / 72
	工人装 / 77
绿军装之魅	不爱红装爱武装 / 86
	烧旗袍，锯高跟鞋 / 92
	剪开鸡腿裤 / 95
	“我要穿军装” / 97
	抢军帽 / 99
	像章，政治小饰品 / 103

趣味的苏醒	西装重返衣橱 / 113
	凤凰浴火 / 117
	服装上的“农民起义” / 123
	抵抗“服装起义” / 127
	领带：最后的边界 / 132
削足适履	喇叭裤风波 / 140
	集体意识下的“蛋” / 147
性感的炫耀	把财富穿出来 / 157
	健美裤vs蜡染布 / 167
	为了张扬的遮掩 / 171
	“给盘老五穿条裤衩衩” / 174
	“衣不蔽体”的性感 / 176
反叛的心思	牛仔裤，暧昧的反叛 / 184
	后牛仔裤时代 / 188
	“别理我，烦着呢” / 194
	T恤的前世今生 / 196

内衣权色 穿，是为了脱下 / 202

现代肚兜阴谋 / 209

男女风情，内衣隐匿 / 212

男权，钻进内衣 / 218

发上秘事 女人长发：鬼魅，浪漫 / 226

光头的罪罚，假发的浮华 / 231

政治杀戮，男人发上 / 238

女人断发，宣示革命 / 250

脚上情色 柳步：摇摆的诱惑 / 269

金莲三寸 / 274

放足，路漫漫 / 280

高跟鞋：现代版缠足 / 287

后记 书不尽言 / 297

引言

脱也有是，穿也有非

1970年，我年轻的生命中发生了三起跟穿衣有关的事：一是脱，二是穿，三是不能穿，不但不能穿，还必须消灭。

这年冬天的一个黄昏，冬日的余晖斜抹在中国西南地区大巴山一个年轻男子的床头。一个女子走过去，捧着他的脸说：“把衣服脱了吧。脱了，就好了。”

她解开自己衬衣纽扣，褪去纯毛蓝色裙子，赤裸地站在他跟前。

男子惊诧不已，望着眼前美好的身体，忽然明白了女子的用意，便也默默地剥去满是补丁的衣裤。两人相拥着，走向门前结着薄冰的池塘。

这对男女带着对生活的无奈，以及对生命赞礼似的庄严，要了却生命。

男子是当地的农家子弟，女子是重庆来的知青。社会地位的悬殊，让他们饱尝了爱的痛苦和绝望。殉情男女脱下彰显阶级身份的衣服，试图以赤裸的肉身去消解那条看不见，却逼仄蛮横地躺在他们中间的等级界线。这时，冰河上赤裸着的不再是单纯的肉身，它构成了一种凄美哀痛的衣衫政治宣言。

现在想来，那女子穿裙子，是为了要发出这宣言的仪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很多城市女性都不穿裙子了，更不用说在农村天天劳作的女人。

不幸的是，他们被人救起，再次穿上衣服，日日被人指点，爱也爱不得，死也死不得。

故事已无法求证。然而，我认为它是可信的。当年，家有知青儿女的城市父亲母亲们，对远在农村的孩子，尤其是女儿，是有很多担忧害怕的。常常见邻人窃窃私语，最怕儿女与庄稼后生私订终身。但是，因为肉体难以承受的劳顿在乡村青年男女的帮助下，大大缓解了，一些知青一感动，就与对方行了周公之礼。

少女时代听来的这个关于“脱”的故事，是我对服饰“界碑争端”最初的个人注释。

陌生男女裸躺冰河的时候，我刚上初中。这年秋天，我又听到了关于“穿”的故事。

一日，学校请来一位中年妇人“忆苦思甜”。

她皮肤黝黑，端坐红旗招展的主席台，痛斥从前东家对她的残酷剥削，日子苦不堪言，声泪俱下。被指定的高年级同学为她的苦难适时地振臂领呼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恨！”操场上随即滚过全校师生阵阵激愤高亢的声浪，仿佛帮她压倒了压迫她的地主阶级。

受到鼓舞的妇人陡然撩起衣服下摆，狠命地把穿在身上的三件衣服一层一层地亮给台下师生的同时，高声赞美新生活：“看看！看看！我现在穿的衣服，好几层嘞！过去，老财主也才穿两件！”

全体师生忍俊不禁。然而，这位妇人质朴的叙述，却概括了衣衫与穿衣人的阶级身份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微妙关系，简约而生动。

穿戴本来就是一场又一场关乎地位、关乎政治、关乎权利、关乎性关系的表演，是一场又一场关乎秩序的战争。有人披金戴银高调出征，有人以脱的姿态消极抵抗，迎战和抵抗都是一种信仰，一种态度。

脱下和穿上，暴露和遮掩，在形而下，是个人在容貌、财富、地位上的较量；在形而上，是个体或群体在与既定秩序明争暗斗。穿红戴绿，不

过是试图赢得战事的战术。

穿与脱，都是表白，都是争斗较量的结果。

输赢的关键在于：怎么穿，在哪穿，在哪脱。

在脱和穿之间，我还听到了“不能穿”。

这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我无意中看见，我奶奶神色鬼祟，在藏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少妇烫卷发，着旗袍，撑阳伞，脚蹬高跟鞋，矜持伫立在上海外滩的堤岸，背对江水。我知道，照片背面还有一行字：“赠：七弟留念。摄于民国三十七年”。在父母的照相簿里，我曾见过这帧照片。

我问：“你为啥要把六娘的照片藏起来？”

奶奶说：“你妈妈的旗袍都改成裙子给你穿了。为啥要改嘞？因为不能穿了。”

“为啥子不能穿嘞？”

“旗袍是四旧，是民国旧衣衫。你六娘这个样子，穿旗袍照相，外人看到了，怕是说不清的。你在外面，不要乱说哈。”

奶奶把六娘穿旗袍的照片放进她的枕头套，天天压在自己脑袋下睡着。

奶奶的举动，让我记住了“民国旧衣衫”五个字。

为什么不是民国衣衫，而是民国旧衣衫，我不甚了然，但懵懂地意识到，这个旧，不是简单的时间的过去时态。因为民国还有一个带政治色彩的统称，叫“解放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去美国留学，母亲坚持带我去民国过来的李裁缝家做了“民国旧衣衫”——三件锦缎旗袍：一件红色无袖，一件黑色中袖，一件绿灰色长袖。她说：“红色可见中国客，黑色可赴西人宴，绿灰色沉静得好，可去学术活动。”

三件旗袍只有黑色的露过一次面，是在美国同学的一次家宴上。在场的男女很惊奇，上下打量，不断问：

“你从香港来？”

“不是。”

“从台湾来？”

“也不是。从北京来。”

“啊？当代中国的女性能穿旗袍？性感旗袍是蒋介石的民国女性的服装，对吧？”

“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女性，也有不少穿旗袍的。”

“嗯？哦！”自人们狐疑礼貌地相视而笑，议论开去，“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女人化妆吗？女人烫发吗？穿高跟鞋吗？……”

只可惜，没有留下照片为证。那时没手机随手拍，随手发朋友圈。那时，聚会是件认真的事，说的，认真，听的，也认真。

脱也有是，穿也有非啊！一件旗袍，竟然扯出了“国共”。这激发了我到衣衫背后去看看的兴趣。

于是，在攻读社会学硕士时，我选择了符号学作为研究方向，把衣衫当作一个具有特殊表述性的符号去看待。我阅读，我思想，我询问，我观察，我笔记。终于发现衣衫的“新”与“旧”，和大历史下的大政治有关，和大历史下的个人政治态度有关。一袭衣衫，暗含了很多东西。

衣衫里面有文化，有政治，有经济，有情仇，有欲望，有挑衅，有抵抗。

一句话，有七情六欲有天机。

衣衫只有脱离了身体，离开了它的主人，才可能以它本真而单纯的模样存在。

从民国看到今天，从道貌岸然的外衣，看到蠢蠢欲动的内衣，从头上的发，看到脚上的鞋。然后，就有了这些从里到外、从头到脚的文字。

说话的衣衫

我奶奶为什么要藏我六娘的照片？我疑惑了很久。1970年，“破四旧”风头已过，我家也已经历过造反派的“抄家”，奶奶为啥还要紧张兮兮地藏“旧东西”？多年后，我才明白，让她心有余悸的不是这帧在“抄家”中漏网的照片本身，而是照片所记录的旗袍让她寝食难安。

这位上过几天私塾的老太太，不懂什么符号学，但她从民国到新中国的生活阅历告诉她，衣衫是会说话的，是会告密的。这一点竟暗合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横空出世的法国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在《衣裳的疾病》中提出的理论：服装就是一种书写。既然能“写”出来，就有太多的含义。

这种没有文字的书写，通过服装的各种细节，如款式、颜色，如饰品，构成了一种特殊的语言，一种无声的人与人交流的世界语。

事实上，人们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利用穿衣打扮，营造“势力范围”，修筑社会各阶层的边界。这个边界，自动地把个人划入某个社会集团，或者划出某个社会集团。比如，有人说你像搞摇滚的，这个陈述就把你归进

了摇滚乐群体。人与人初相见，就借助衣衫相互揣测、界定，彼此的文化背景、经济基础、社会地位、政治倾向，甚至性态度和性取向：

在街上，在会场，在聚会中，在我还没走近与你交谈时，你所穿的衣裳已经宣布了你的性别、年龄、阶层。而且，极有可能还告诉了我一些有关你的重要或者错误的信息：你的职业、出身、个性、主张、品位、性欲以及眼下的情绪。而我的穿着，同样也会告诉你我的一切。^[1]

在符号学的意义上，服饰具有强烈的表述性。无论职务高低，文人文盲，贫穷富有，都得穿衣。也许穿衣人有所预谋，也许无所预谋。有或没有，服饰都是个人和群体的发言人，只要你走出家门，身上衣衫基本就掌握了话语权。结果，文字和话语，在衣衫这个会说话的符号跟前，时常显得苍白无力，穿衣人再能说会道，也无用，也敌不过衣衫。正所谓，先敬衣衫后敬人。

我的朋友鱼马，始终记得发生在他身上，至今还未释怀的“穿衣事件”。

1966年，鱼马八岁。一日，他头戴鸭舌帽，着哥萨克式的白衬衣、黑皮靴，皮带随意在腰间揽住宽松的衬衣，在成都正午的街市买糖人吃。正怡然自得，忽听身后两个妇人在议论。

“歪戴帽子斜穿衣。”一个说。

“长大不是好东西。”另一个接上。

鱼马本能回头，迎接他的是两个妇人严厉的目光，像锯子，在他身上

[1] Alison Lurie, *The Language of Cloth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83, p.3.

拉来拉去。

他惊恐不安，扭头狂奔回家，朝母亲又是跺脚，又是喊叫，脱下衣服，恶狠狠地扔在床上，把那妇人的对话学舌一番。他母亲便也有了一些不安，隐约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急忙翻箱倒柜，另找一套不会招致邻里议论的衣服给他换上。

鱼马的母亲从事话剧，接受的是苏联戏剧表演训练。这位夫人与众多中国文化人一样，对俄罗斯文化满含深情，且总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给儿子的穿衣打扮，是她无法摆脱的俄罗斯情结的外化表现，是她对俄罗斯美学理念认同的抒发。然而，在“文革”如火如荼的1966年，鱼马的打扮显然有悖于成人社会确立、认同、遵循的某种秩序，以及穿衣规则。

别人家的小孩子，都规规矩矩地穿小翻领、前门襟开扣的衬衣，你家鱼马不但穿异国情调的套头小立领衬衣，还镶了花边。别人家孩子的皮带，都规规矩矩地系在裤腰上，你家鱼马却要系在衬衣外面，还那么随意。这不仅是打扮的出格，更是对既有道德秩序的轻蔑。大人公开揶揄鱼马，意在暗示孩子的打扮其实是家长仰慕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投影，这在革命时期，很可能会在政治上给家长招来厄运。暗含的信息终于通过小孩的嘴直接传递给了大人。因此，鱼马的母亲才会感到恐慌，才会赶紧给他换衣。

服饰无声，服饰有言。穿戴上身，就开始说话，无时无刻不在说，且说话声比你大，比你有说服力。潜伏在服饰中的话语，有时暴露秘密，有时暗藏阴谋。语气和用词，有时轻松活泼，丰富多彩，有时枯燥沉闷，严肃紧张。忽而这样、忽而那样的姿态，却正是既定社会生活、政治秩序、经济形式的镜像，生动真实而残酷。

民国女装，风来满路香

回望民国时期的男女衣衫，其用词丰富，语气润朗，款式繁华多元，又井然有序。各行各业，各就各位，行止不失范，穿衣不越界，拿捏到位，特征了然。尽管军阀混战，人仰马翻，尘土飞扬，但当年《申报》《大公报》等甚得读者喜欢的报纸，对此类报道并不像今人想象的那样连篇累牍，反倒是对名媛豪门故事、穿衣出行，给足了笔墨版面。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个人在服饰上的表达是宽松的，自由的，甚至随心所欲的，似乎都把心思用在了打造个人的第二张脸面——衣衫上，而国家大事交给为多数人谋福利的少数英雄打理了。

在没有强大的政治外力作用下，民间，尤其是民间的女人，任何时代都会在衣衫上搞名堂。旗袍，便是民国上海女人搞出的妖艳名堂。一如乱世出英雄，服饰如旗袍，在乱世中亦自有花儿朵儿的路数。战乱，本不该给时装留面子留出路，但令人惊诧的是，现代旗袍不仅在战乱中诞生，还在抗战时的上海“孤岛”岁月中，发展成了女子的国服，那么端庄，妩媚，性感。

“孤岛”时期（1937—1941），由于租界尚未遭日军践踏，社会生活秩序相对稳定，大批文学艺术家聚集“孤岛”，写出了许多流传后世的作品，如于伶的《夜上海》、郭沫若的《虎符》、曹禺的《日出》《雷雨》等，都在此时璀璨绽放，成就了文学、戏剧和电影史上特殊的繁荣期。

这么一说，乱世似有了几分明朗简静。这明朗简静是一定要清晰地映照在衣衫上的。无数次查阅民国衣衫的书籍资料，翻看在民国大街后巷闪现的衣衫影像，见着了这样一些男人：衣着讲究得体，面容谦逊；见着了这样一些名媛：穿旗袍撑阳伞，矜持着，却又不傲慢。一些时髦女子，一身洋装，摩登得不行，却不轻佻；一些市井小女少妇，布衣布鞋，举手投



民国时期，各行各业，行止不失范，穿衣不越界，特征了然。这是北方一户优渥人家的全家福。凌飞 提供

足间，竟也透着几分婉约，安静着，亦不失活泼天真。不禁记起唐朝诗僧寒山的诗句：“群女戏夕阳，风来满路香。”

“满路香”在这里，是形而上的，是民国衣衫，民国女人的衣衫，姹紫嫣红满目春气象的香氛。由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把小皇帝溥仪拉下了马，成立了民国，在政治上，国家是民主共和政体，因此，在私人的穿衣打扮上，男女服饰尤其是女人的服饰，多有来自西方灵感的影子。这一点，在三十年代上海月份牌广告上，表现得尤为集中强烈。月份牌上的女子，完全是西风吹拂过的身姿笑颜。一些女子衣衫轻薄，胴体若隐



这是杭輝英为上海中法大药房绘制的广告。三十年代上海月份牌广告上的女子，完全是西风吹拂过的身姿笑颜，时尚摩登，其开放程度放到今天也是极其大胆的。

若现，带着几分情色，其开放程度放到今天也是极其大胆的，足令后来者望尘莫及。

民国初期，社会各方面颇有一种清明气象，女子衣衫更是繁花似锦。民国女子张爱玲，对她姐妹们穿衣打扮的观察以及叙述，堪称细致入微。她看到，她们的衣着是：

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上层阶级的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袴，丝袜也只到膝为止，袴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袴底垂下挑拨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袴带，带端飘着排穗。^[1]

对社会生活细节的观察，张爱玲配得上细致入微这个词。她说的“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是与前朝的，也就是清朝的女子服装相比而言。

清朝统治的268年间，女人服饰整齐单调得很，一代一代的，几乎没有变化。1644年满人入关进京，服饰上是“男从女不从”，满女汉女各不相犯，各自保持自家的服饰形制。旗下满女穿她们的传统长袍——旗袍，汉女继续穿明朝延续下来的旧服，穿她们的裙衫袄裤，穿她们的宋明就流行的褙子、比甲，直到晚清。

褙子和比甲值得一提。褙子，是长款长袖衫，立领对襟，两侧开衩到腋下。比甲，是长款对襟背心，也是两侧开衩，穿在衣衫外。这两款女装，今天仍受到北京有点文化腔调的文艺中青年女性青睐，可见其个性的独特。

[1] 张爱玲：《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61页。